

● 哲 学

丸山真男的日本思想古层论初探

徐 水 生

(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,湖北 武汉 430072)

[作者简介] 徐水生(1954-),男,湖北黄石人,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副教授,哲学博士,主要从事中日哲学思想交流史研究。

[摘 要] 丸山真男经过长期的精心研究,揭示出了日本思想中的“古层”。这个“古层”是将外来的儒学、佛教、西学改变为“日本式”的重要文化契机;日本的思想既不是中国思想、西方理论的复制品,也不是绝对的“内发”产物,而是外来文化的绝对影响和“古层”的执拗性生存之矛盾的统一。“古层论”深刻地揭示了日本深层文化中的奥秘。

[关键词] 日本思想;古层;历史意识;执拗性

[中图分类号] B3 **[文献标识码]** A **[文章编号]** 1000-5374(2000)03-0324-05

丸山真男(1914-1996年)是日本现代著名的思想史家、政治学家、思想家,原东京大学教授。他长期从事日本思想史和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,先后出版了《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》《现代政治的思想和行动》《日本的思想》《战中和战后之间》《读〈文明论概略〉》《忠诚与叛逆》等著作,在日本的学界和广大民众中产生了重大影响,人们将他与明治时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相比,称之为“战后的启蒙思想家”。从1966年开始,丸山真男的著作先后在欧美出版有英、德、意等多种文本,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高度重视。现在,日本一些大书店均设有丸山真男的著作及其研究的书籍专柜。可以说,日本学术界已兴起了一股“丸山真男研究热”,以探讨丸山真男所留下的精神遗产。

丸山真男从20世纪30年代中叶开始进行日本思想史的研究,着力发掘日本近代化的思想起点;40年代中叶转入政治学的研究,深入批判和清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;60年代后又回到日本思想史的研究,提出了重要的“古层论”,系统地探讨了日本思想文化个性的形成原因。他在1972年发表了其力作《历史意识的“古层”》,1979年发表了《日本思想史中的“古层”问题》,1984年又发

表了《原型·古层·执拗低音》,这一组关于“古层”的论文是“丸山氏同类论文中充满最大魔力和魅力的作品之一”,“揭示出了日本思想史中所隐藏的秘密”^[1](第491页)。

丸山真男提出“古层论”是有其发展过程的。他在长期的教学和研究中深深感到,与异质文化的接触是日本思想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尤其是通过1961年9月至1962年4月赴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、瑞典、西班牙、法国等欧美诸国进行学术交流后,他进一步加深了对上述问题的思考,认为必须从与异质文化接触的角度重新认识日本思想史。如:大化革新和明治维新是日本的二大变革,然而,这“二新”均与非常优秀的外来文明接触密切相关。在古代,日本大力吸收中国隋唐文化,产生了大化革新,形成了以唐律为模式的律令体制;在幕府末期,日本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下,幕藩体制崩溃,形成了明治维新的局面。从这个观点来看,日本思想史的主旋律一直是外来思想,古代是来自中国的儒学、佛教,近代是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、民主主义、功利主义、马克思主义。但是,这些外来思想传入日本后便发生了变形,

形成了日本化,它们已不同于原产国的本来面貌。“那么仔细看看儒学被日本化的过程、佛教被日本化的过程,以及欧洲思想被日本化的过程,马克思主义被日本化的过程,其中有共同的模式,而且是惊人的相似,这就是古层问题”^[2](第 181 页)。

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,丸山真男在 1963 年的讲义中最初用的是“原型”概念,但随后觉得它给人感觉有强烈的宿命论影响,似乎日本人的世界观在古代就被决定了,容易招致误解。于是,1972 年,他将“原型”改为“古层”。形式上的概念改变了,但“实质上的思想并没有改变”。那么,为何要改用“古层”概念呢?第一,因为它的“超越时代持续运动的层次性更加明确”。第二,它“至少不象‘原型’那样给人一种宿命论之感”^[3](第 150 页)。思想史上的“古层”,是借地质学上的概念和比喻。地质学上的“古层”,是指地质结构中最下面的一层,其上有多层结构,如果发生大地震,古层甚至有翻过来的可能性。考虑到古层可能在某个时代会隆起在地上,它有各种各样的可塑性,故而用此较为容易说明思想史的变化。儒学、佛教、欧美思想等外来文化陆续进入后,在日本历史意识“古层”之上并通过“古层”不断变化和逐渐积累,形成了一个多层化的结构,“古层”是这种结构的重要基础。丸山真男又将思想上的“古层”比喻成音乐上的“执拗低音”,它是可以变换着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的音型,和主旋律一起混合而响。

何谓历史意识中的“古层”呢?丸山真男指出:“这里将《古事记》和《日本书纪》神话的开头叙述中表现的思想表达方式作为历史意识的‘古层’,并挑选出其中几个(但又是普通的)基础性范畴,当然它们是指与历史有关的、我们祖先的不折不扣的‘最古’的思考方法”^[4](第 6 页)。成书于公元 712 年的《古事记》和成书于 720 年的《日本书纪》是日本最早的二部历史书,虽然它们是用汉字记述的关于日本民族社会、政治、历史的神话和传说,但丸山真男采用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,经过长期的认真研究,从历史意识中提升出三个最重要的基础性范畴,即“なりゆき”(产生、发生)、“つぎつぎ”(持续、接连不断)、“いきほひ”(趋势、时势),这是“从构成日本历史意识的古层而且是通过其后历史中展开的、作为执拗的持续低音的一直余音不绝的思维方式中,抽出的三个原基性范畴。如果将其归纳成一个命题的话,那就是‘つぎつぎになりゆくいきほひ’(持续产生的趋势)”^[4](第 45 页)。

丸山真男所说的“古层”主要有二大特点,第一,古层只是“断片性的想法”^[3](第 140 页)。“其自身未

能构成独立的思想体系”,“它不是与儒学和基督教并行的世界观”^[2](第 189, 190 页)。“无论在哪个时代,也未能成为历史思考的主旋律。”^[4](第 45 页)他甚至指出,日本神话能在公元 6-7 世纪左右成型,是因为受到来自大陆的各种文化的渗透。如果采取数学上的消去法,从日本神话中消去中国思想的观念(不仅是儒学,而且包括道家思想、诸子百家)和范畴,消去由中国传来的佛教观念,那么《万叶集》、《灵异记》中什么重要的思想和内容都没有了。只剩下某种东西——原型,即表现为某些断片。“原型其自身决不是教义。要作为教义、作为体系化,必须借助外来世界观的帮助”^[3](第 149 页)。有人可能将神道作为原型,为了避免混淆,丸山真男特意强调,古层不是神道。“道”这种概念和观念是在儒学、道家思想、佛教这类外来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,而且“教义神道”的“教义”内容大体是佛教、儒学思想的汇集。如,两部神道是与佛教的结合,吉田神道和吉川神道是与儒学的结合。总之,神道不借助外来的思想,就不能形成“教义”类的体系。如果说神道与“古层”有何联系的话,那就是原始神道中还有些“古层”的零碎材料。一旦将这些零碎材料或片断想法夸大成日本精神的思想体系的话,就会走向神学和荒谬,前者可以国学为例,后者可以“二战”中的皇道精神为例。

“古层”的第二个特点是,“构成古层历史观的核心既不是过去,也不是未来,而是‘现在’”^[4](第 55 页)。丸山真男的这种概括来源于《古事记》,此书开篇伊始说:“天地初发之时”,它有着“天地之初以今为始”之意,即瞬间即逝的“现在”作为天地之始,此时的能量在瞬间像火箭一样被发射出来。这是具有日本特色的宇宙生成论观念,不同于“盘古开天地”类的中国宇宙发生论。从“现在”出发,已经提炼成了日本的传统,日本历史的乐观论形成了一整套的尊重“现在”。过去,是其自身无限追溯而生成。作为“成为”和“生成”的过程而形成观念的过去,不断表现为现在。在某种意义上说,现在代表全部过去。这样一来,所谓未来,无非是满载从过去而来的能量的现在,从现在的“开始”。“平常所说的‘现在’,有天地初发的意义,是未来志向型,具有单一方向性。……所谓未来志向型,是从今日向着明日,并不一定设定明后日以后的遥远目标。……而是不断地享受着转瞬之间的现在,接受瞬间不断的潮流,故适应性很强”^[2](第 201 页)。因而,从外来思想传入的情况来看,不论是东方的儒学、佛教、道家哲学,还是西方的自由主义、民主主义、马克思主义,都很快地几乎是无障碍地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,这种情况在其

它国家较为罕见。如以西方进化论的传入为例,在日本明治初期传入不久,便与重视“现在”的进步观相融合,恰似进入无人之野,星火燎原般地得到蔓延,不论是在朝的官员,还是在野的人士,不论是民族主义者,还是欧化主义者,均被这种强调进化、强调发展的理论所吸引。相形之下,西方进化论虽然也在中国得到了传播,但它至少受到两方面的抵制,一是坚持“天不变道亦不变”的保守思想家的强烈抵抗,二是腐败的统治者的抗拒。

再从日本的历史发展来看,这种重视“现在”的意识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力。如在古代,“从大化革新开始的一系列改革,确实以同时代(即‘现在’)的中华帝国制度为模式,坚决‘割断’了‘昨日’的旧习”^[4](第 57 页)。在近代,日本以当时(“现在”)最先进的欧洲国家为模式,实现了成功的明治维新改革,很快跃入了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。就此意义而言,日本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追赶模范国的历史,古代长时期以中国为模范国,近代则将模范国换之欧洲诸国,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以美国为模范国。所以,丸山真男总结性地指出:“把我们历史意识特征规定为‘持续地变化’,从某个侧面来说,它也许是现代日本定位于世界最先进国的重要原因”^[4](第 64 页)。

二

丸山真男进一步深刻指出,“古层虽不是主旋律,但它是改变主旋律的契机”^[2](第 181 页),“能对‘陆续不断’地被吸取的诸观念给以微妙地修饰,有时几乎可以丰富我们的意识,将整个旋律的声音改变成‘日本式’的”^[4](第 45 页)。这就是说,日本历史意识中的“古层”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功能,它能起到改变外来思想的特殊作用。

首先,丸山真男以传入的《周易》和儒家的历史观进行了说明。《周易》是中国先秦的重要著作,也是日本人在历史性思考中使用得最为频繁的著作之一。《周易》尤其是其中的《易传》,强调事物的变化和发展,认识到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转化到其反面,注重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对于事物变化和发展的制约和影响,把世间最根本的规律概括为阴阳对立面的交互作用。它提出了“穷则变,变则通”的著名命题,但其“变”又以“通则久”的循环论或静止论为归宿,以歌颂所谓“圣人”统治的合理性和永恒性。一般来说,儒家的历史观强调时代前后即古今之间的联系,但它有过于好古的传统。如《论语·为政》中记载儒学先师孔子的话:“殷因于夏礼,所损益可知也;周因于殷礼,所损益可知也。其或继国者,虽百世可知

也”。儒学亚圣孟子言:“言必称尧舜”。西汉大儒董仲舒则更明确地说:“奉天法古,……不览先王,不能平天下”。他们都过分强调了对上古模式的继承。

但是,《周易》的哲理和儒学的历史观传入日本之后,却有了一些明显变化。如在《通议》卷一中有儒学家赖山阳(1780—1832年)在《论势》中说的话:“势极则变,变则成”,“势者以渐而变,以渐而成,非人力所能为”。他将《周易》的“变则通”的命题与“势”的范畴相结合,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上指出了“势”的渐进性、客观性和重要性。又如,在《经济录》卷十中有儒学家太宰春台(1680—1747年)以《周易》“待时而动”的思想为基础的记载,提出“应宜其时而行政,若不知时而施政,纵使尧舜禹三王之道,与时龃龉,亦决不行之”,大胆地将不断发展变化的时势为本,以儒家提倡的尧舜禹之道为末,二者冲突时,可舍末求本。他又说,“先王之天下亦及末世而政生弊……卒起祸乱以至灭亡。是则阴阳消长之理,物极则变,天地有常数,故也。是则易道也。”太宰春台不是像中国儒学家那样,以“易理”论证先王之道的绝对性、永恒性,而是用“易理”来解释先王之道的相对性、局限性,从中可看出日本儒学家的“异端”特点。再如,山县太华(1781—1866年)在《国史纂论》卷之二中指出:“治乱盛衰则天地之气运,而人情趋向亦与时推迁,是自然之势也。故圣人有通变之道,随时而变化,其道不穷矣。……今欲使太古简朴之风长无变,人情趋向常如一,则非天地自然之理也”。这实际上是以《周易》的“变通”思想为基础和价值标准,批判了中国儒学历史观中以古为本、以古为美的守旧观点,提倡一种“与时推移”的社会观和历史观。

以上例子说明了两个问题:第一,日本思想家对《周易》的运用已经突破了“通则久”的思维框架,将“穷则变,变则通”的思想贯彻得更加彻底。第二,日本思想家将《周易》与日本历史意识的“古层”相结合,论述了一种不同于中国儒家的新历史观和社会观。总而言之,日本思想家吸收和运用以《周易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的过程中,已对之进行了改变或修正。正如丸山真男所指出:“这与其说是从‘正统’到‘异端’的展开,倒不如说是持续性的古层在表层中呈现的过程。”从更广的角度来说,“江户时代的历史性活力,不仅仅在于‘近代化’的一方进行的,而是在近代化与‘古层’隆起的二种契机的相互对立与相互统一的复杂性的多重中进行的,虽未必仅仅在思想史的领域,但即使仅陷于思想史中的问题,例如从理气哲学到华夷内外论,对于日本宋学被招致修正的命运来说,已被深深地刻上了这种二重性的性格”^[4](第

48-49页)。

其次,丸山真男又以佛教的传入、改变为例加以了说明。佛教于公元前 6 至 5 世纪产生在古印度,公元 1 世纪左右又传到中国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壮大,形成了天台、华严、禅宗、净土等新的宗派,公元 6 世纪又通过朝鲜半岛传到日本。经过长期的传播,佛教与日本历史意识的古层相融合,已发生了有别于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明显变化。佛教的教义复杂,内容丰富,这里仅以其“无常论”和“轮回说”为例来说明佛教在日本的变化。佛教的“无常论”认为,时间万有(一切事物和思维概念)都是生灭变化无常的,宇宙间一切现象都是此生彼灭、此灭彼生的相互依存关系,没有永恒的实体的存在。所以任何现象都是无常的,表现为刹那刹那生灭的。佛教的“轮回说”认为,一个人的灵魂(我)在死后可以在另一个躯壳中转生,转生的形态取决于他生前的行为(业),行善者得善报,行恶者得恶报,有的可以进入天道、祖道(人间),有的则堕落入兽道,沦为苍生等。佛教沿用了这个原则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,认为,众生今世不同的业力在来世可以获得不同的果报,贪、嗔、痴等烦恼可造成恶业,由恶业招感苦报。苦报之果,果上又起惑造新业,再感未来果报,经复流转,轮回不止,因此轮回贯通现在、过去和未来三世。佛教中不论是“无常论”,还是“轮回说”,都有一个特点即轻视乃至否定“现在”,厌世情绪极浓,一切着眼于来世。

日本历史意识中的“古层”,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佛教的教义和思想,这正如丸山真男所指出:“‘诸行无常’的观念,一方面与‘持续的变化’的乐观主义激烈的摩擦,另一方面不是在‘永远的相之下’,而是在不断的变化和流动的相之下,具有将所有与所见到的‘古层’世界观相互融合的奇特命运。”“根本否定现世的逻辑进入了日本历史意识古层之后,佛教哲学中的‘三世’即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的‘因果’都开始含有现世历史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因果联系的意义,在这点上确实使印度哲学中贫乏的历史思考变得更加丰富。不仅如此,肯定‘现在’,不是肯定生的积极价值,而是只限于肯定作为不断变化的现在。被肯定的现在的确是‘无常’的,作为‘无常’的‘现在世’在被细分为无数的‘现在’的同时,也得到享受。作为‘变迁’的现在,因为由于下一个‘现在’,不得不以不断地迎接下一个瞬间(表示遥远的将来)的一种不安定的精神准备而呈现”^[4](第 59 页)。

日本的佛教思想是在充分肯定现在的基础上,来谈论“无常”和“轮回”的。具体来说,亲鸾是其典型。他一方面坚信阿弥陀佛,创立了净土真宗,进行

传法活动,另一方面又主张僧侣可以娶妻,应享受“现在”的人生,开了日本佛教新风之先河。他本人 1203 年娶藤原兼实之女玉日为妻,玉日死后,又娶了三善为教之女。在吸收了佛教哲学的日本文学作品中,这类既相信“轮回说”,又强调充分享受现世例子的更多,如《万叶集》中就有不少,“今世快乐,来世我们可能会变成虫和鸟”,为了今世的快乐,即使冒犯了佛教“五戒”之一的饮酒戒,来世变为畜生也在所不惜。近松门左卫门(1653-1724 年)的文学作品中,这类例子也俯拾即是。一边享受着现世人生,一边对生的执著并不那么强烈,这种两面性已经深深扎根于日本思想和文化之中。

三

丸山真男经过长年深思而凝结的“古层论”,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特殊的历史贡献。

首先,丸山真男拨开了日本思想研究中的层层迷雾,深刻而准确地指出了日本思想的个性。日本在古代吸取了儒学、佛教、道家思想,在近现代吸取了欧美文化,从而促进了日本思想和文化的发展。这种吸取是一个传入、改造、变形的复杂过程,需要全面而辩证地看待。但在理解日本思想的问题上,因情绪的偏激和方法的简单,出现了种种错误观点:有的认为日本思想史是外来思想歪曲的历史,有的试图完全离开“外来”思想单独地寻求所谓日本“内发”的原始思想内容。丸山真男语重心长地说,“日本思想中‘日本性的内容’,作为实体的形态是抽不出来的。因为其底层都被外来思想所浸透,将各种东西融合在一起。”因而,那种孤立地“内发论”,“至少作为日本思想史的方法,它难逃失败的命运”^[3](第 144 页)。德川时代的“国学”悲剧就是此类典型事例。从全球范围来说,人类思想文化史有着普遍的内容和共同的规律。从地区性的角度来说,东方有儒学、佛教、伊斯兰教等思想,西方有古希腊哲学、基督教、实证主义等思想。这些普遍性和特殊性均不能代替日本思想的个性。那么日本思想的“个性”是什么呢?丸山真男深刻地指出,它是“外来文化的绝对影响和加之所谓‘日本的东西’(‘古层’)的执拗性生存的矛盾的统—”^[3](第 138 页)。这是极其重要的结论。即一方面要承认从古代到近代日本思想的主旋律是儒、佛、道、西方思想这个历史事实,另一方面要注意到日本历史意识“古层”的转化契机功能,只有从二者的统一中才能把握住日本思想文化的个性,才能较为准确地说明日本儒学、日本佛学、日本自由主义、日本民主主义、日本马基思主义等思想内容的特点。

其次,丸山真男提出了文化接触和文化变形的重要问题,这在文化学方法论上有着普遍的意义。就大多数东方国家来说,面对现实都有一个文化现代化的问题,即如何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精华,以推动本国文化和社会的发展。从西方国家来说,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新世纪到来和社会生活的多方面需要,也有一个文化多元化的问题,即如何吸收东方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内容(这种吸收并非从 20 世纪开始),以促进本国文化和社会的发展。可以说,21 世纪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、融合的新世纪。因而,不论是东方,还是西方,都有一个与异质文化接触的问题。只要异质文化传入,就会与本土文化发生碰撞融合,并产生新的文化形态即变形。如何把握好这类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、恒常性与变化性、世界性与民族性,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。丸山真男的“古层论”及对日本思想史的典型分析为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大致的方向,从世界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意义上来说,这是一个重要的贡献。

再次,丸山真男在“古层论”中有关日本思想乃至世界文化的许多具体论述,为我们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迪。如关于日本思想是“未来志向性”的观点,他认为,日本思想史中“既没有强烈的复古主义,也没有乌托邦思想”^[2](第 201 页),与中国儒学和道家的复古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关于日本民族有着强烈的模范国意识的观点,他认为,正因为有了这种意识,所以日本不停地“赶超模范国”^[2](第 204 页),使整个社会加速发展。关于日本神话的“个

性”的观点,他在与东南亚、希腊、北欧等地神话进行了比较之后指出,在日本神话中,天地的创造、国土的产生、最高统治者祖先的出现,此三者是一个紧接着一个地在时间、历史的系列中展开下去的,这“在世界有数的‘神话’中是极独特的”^[3](第 137 页),从中也可看出日本文化的个性。关于中、日、韩三国儒学的比较论,他也有石破天惊之语,“从正统的中国来看,朝鲜是教条主义的、极左偏向的异端,日本相反倒成了修正主义的、右翼性的异端。以中国为中心,朝鲜和日本恰好处在正相反的位置上,两者的距离最远。即使说江户时代的儒学史从一开始就是修正主义的,也不为过”^[3](第 188 页)。这是在座谈会上的一段发言,语言虽极诙谐,但概括却相当深刻。总之,丸山真男的著作是一座丰富的学术宝库,只要去认真阅读,精心思考,就会启发良多,受益匪浅。

参 考 文 献

- [1] 日 丸山真男. 忠诚与叛逆 [M]. 东京: 日本筑摩书房, 1998.
- [2] 日 丸山真男. 丸山真男集: 第 11 卷 [M]. 东京: 日本岩波书店, 1996.
- [3] 日 丸山真男. 丸山真男集: 第 12 卷 [M]. 东京: 日本岩波书店, 1996.
- [4] 日 丸山真男. 丸山真男集: 第 10 卷 [M]. 东京: 日本岩波书店, 1996.

(责任编辑 严 真)

Japanese Thought of MARUYAMA Masao Depth-Layer Theory

XU Shui-sheng

(School of Humanities, Wuhan University, Wuhan 430072, Hubei, China)

Biography XU Shui-sheng (1954-), male, Doctor, Associate professor, School of Humanities, Wuhan University, majori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philosophy.

Abstract MARUYAMA Masao has revealed the depth-layer of Japanese thought through long-term and elaborate research. He thinks that the depth-layer is the turning point of becoming Confucianism, Buddhism and Western culture to the important culture of Japan. His depth-layer theory reveals deeply the secret in Japanese depth culture.

Key words Japanese thought; depth-layer; historical ideology